

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程广斌 杨春¹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文章从融合动力、融合趋向、融合环境三个维度出发解析产业融合水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 2008-2017 年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及其沿线省市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但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差距明显，大体上呈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的分布格局，但这种差距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市场需求、科技进步、人才资源、政策支持和行业竞争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需求、科技进步、人才资源和行业竞争的影响效果较为明显，而政策支持则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短板。

【关键词】：区域产业融合水平 长江经济带 影响因素 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F26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20）04-0100-08

一、引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产业发展已脱离传统路线，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融合发展的理论，产业融合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新动能，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产业融合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工场手工业时期，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分工将趋于收敛，并会出现在分工基础上的结合生产，这可以说是融合思想的起源^[1]。进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产业融合”现象日渐增多，1978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Nicholas Negroponte 用三个重叠的圆引出了以技术融合为基础的“产业融合”的概念，“产业融合”一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到了 20 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产业融合现象的频发、融合产业所涉及范围的越来越广以及融合程度的深化，国内外学者逐渐掀起了产业融合的研究热潮^[2]。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产业融合理论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为各国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证考察方面，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在研究对象上，现有文献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层面^[3]，而对某个经济区域产业融合^[4]的研究则较为鲜见；在研究视角上，既有文献大都从诸如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5]、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6]等某两个产业的融合以及像旅游产业^[7]等某个产业的融合的视角出发，鲜少有从所有产业融合的视角出发研究一个地区整体产业融合的情况；在产业融合的测度上，虽然国内外学者早已提出诸如专利系数法^[8]、产值贡献度法^[6]、投入产出法^[9]、综合指标法^[10]、赫芬达尔指数法^[11]等测度方法，但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现有方法各有侧重，因而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全面地科学测度产业融合的真实水平。此外，现有文献大都集中在对产业融合后向的绩效研究，而对产业融合前向的影响因

¹基金项目：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兵团农牧团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17YB07）

作者简介：程广斌（1976），男，安徽淮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副院长，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杨春（1993），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素则缺少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尝试在解析产业融合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长江经济带及其沿线省市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并实证考察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以期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评价

（一）产业融合的内涵解析

科学评价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关键，在于科学解析产业融合的内涵。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融合内涵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其一，融合动力说，即从产生融合动因的视角出发，认为产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政府放松管制来减少产业间的壁垒，加强各产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12]；其二，融合趋向说，即从产业融合方式视角出发，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13]；其三，融合环境说，即从产业发生融合的环境视角出发，认为产业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14]。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产业融合是指在一定的经济环境背景下，由于技术进步、放松管制等原因，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细分行业，通过产业间的渗透、延伸、重组进而形成新产业、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区域产业融合水平指的就是在产业高速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技术进步、放松管制等原因，区域各产业之间通过渗透、延伸、重组等方式产生融合的综合水平。因此，笔者将根据对产业融合内涵的理解，构建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上文对产业融合内涵的分析，本文从融合动力、融合趋向以及融合环境三个维度出发，依据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实施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设计原则，并借鉴学者唐晓华（2015）^[10]的区域产业融合 ISCNFI 测度体系以及程广斌、杨春（2019）^[2]的区域产业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构建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从融合动力视角出发，技术进步、政府管制放松等动因构成产业间相互融合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其中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的内部动因，是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力，而政府管制放松则是产业融合的一个外部刺激因素。考虑指标的可量化程度和代表性，本文决定剔除政府管制放松这一因素，加入人才资源因素。人才资源作为贯穿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行为主体，是产业向更好层次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整体人才层次的提高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从而进一步促进产业的融合发展。综上，本文选取技术进步和人才资源 2 个二级指标来描述融合动力，分别表征产业融合的硬动力和软动力。具体选取每百人专利申请受理量、R&D 经费投入强度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比重 3 个三级指标，分别从产出、投入以及流通三个方面表征技术进步水平；选取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就业人员比重和单位 R&D 人员全时当量 3 个指标来诠释人才资源质量。

从融合趋向视角出发，根据学者秦嗣毅（2008）更为细致的分类方法，可以把产业融合的方式分为四种：一是渗透式融合，多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二是改造式融合，一般指信息技术产业对传统工业的改造；三是延伸式融合，即通过产业间的互补和延伸，实现产业间的融合，多体现在服务业向农业和工业的延伸部分；四是产业内部的重组式融合，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如今的重组融合越来越倾向于以信息技术为链接的邻近产业重组融合^[15]。由此可见，产业融合的产生与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以产业高技术化、产业信息化和产业服务化 3 个二级指标来诠释融合趋向。其中，产业高技术化主要从高技术产业自身发展水平的角度考虑，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产业高技术化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因素，本文拟选取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高技术产业就业比重、高技术产业新产品收入比重 3 个三级指标来表征；产业信息化的描述主要从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信息网络的覆盖程度两个方面考虑，选择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信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比重、互联网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 4 个三级指标来表征；产业服务化的考量从服务业发展水平出发，选择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比重和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3 个三级指标来描述。

从融合环境视角出发，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投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为国际间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互动平台，促进各产业在互动中摩擦出融合的火花。此外，从一国或地区内部的经济环境考虑，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则更有利于该区域产业向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发展。因此，本文将从内部经济环境与外部经济环境两个方面来描述一级指标融合环境。其中，内部经济环境从体现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均 GDP、社会劳动生产率 2 个三级指标；外部经济环境，从体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全球化的角度来描述，选择对外贸易指数、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比重 3 个三级指标。

（三）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随着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文件的出台，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现阶段引领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战略新布局。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所覆盖的 11 个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为研究对象。由于部分指标数据统计较晚，本文将研究时段定为 2008–2017 年。数据主要涉及 2009–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以及相关书籍《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和相关的统计公报等。此外，为避免受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部分指标采取了以 2008 年数据为基期的价格平减处理。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指标权重（表 1）方法的选取上，综合考虑面板数据的适用性、权重计算的客观性以及保障计算结果的纵向可比性三个方面，最终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6]：

第一，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

正项指标， $y_{tij} = (x_{tij} - \min_j \{x_{tij}\}) / (\max_j \{x_{tij}\} - \min_j \{x_{tij}\})$ ；

负向指标， $y_{tij} = (\max_j \{x_{tij}\} - x_{tij}) / (\max_j \{x_{tij}\} - \min_j \{x_{tij}\})$ 。

第二，为保证求权重过程中取对数有意义，需先对数据进行非负化处理：

$$y'_{ij} = y_{ij} + 1。$$

第三，求比重矩阵：

$$p_{ij} = y'_{ij} / \sum_{i=1}^s \sum_{j=1}^n y'_{ij}。$$

第四，计算各指标熵值：

$$H_j = - (1 / \ln s) \sum_{i=1}^s p_{ij} \times \ln p_{ij}。$$

第五，计算各指标的差异系数：

$$F_j = 1 - H_j。$$

$$W_j = F_j / \sum_{j=1}^m F_j$$

第六，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通过对各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公式如下：

$$Z_{it} = \sum_{j=1}^m w_j x_{itj}$$

其中， Z_{it} 即代表 t 年 i 省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利用上式，计算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

表 1 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权重

X_1	X_2	X_3	X_4	X_5	X_6	X_7	X_8	X_9	X_{10}	X_{11}
0.065	0.065	0.045	0.029	0.067	0.036	0.065	0.079	0.050	0.064	0.030
X_{12}	X_{13}	X_{14}	X_{15}	X_{16}	X_{17}	X_{18}	X_{19}	X_{20}	X_{21}	
0.044	0.038	0.030	0.040	0.042	0.046	0.051	0.041	0.050	0.023	

注：数据根据 2009–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五）结果分析

1. 长江经济带整体区域产业融合水平

长江经济带整体区域产业融合水平不断上升，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良好。如图 1 所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处于不断提升的态势，由 2008 年的 0.203 稳步上升到 2017 年的 0.408，但总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距离理想值 1 存在很大差距，亟待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期间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年增长率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大。由 2009 年的 8.99% 急剧下降到 2010 年的 6.50%，然后在 2011 年又激增到 11.39%，达到增长率的峰值。可见，2008–2011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这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密不可分，金融危机的爆发，先是对国内现有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得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增速下降，而后是应激反应所带来的国内各产业的进一步洗牌重组融合，使得增速迅速得以回升。这之后，虽然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增长速度在 2015 年和 2017 年有所回升，但其整体还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这种递减式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又与国内当时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息息相关。但从年均增长率来看，其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 8.04% 左右，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呈现出持续稳步上升的趋势。

2.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区域产业融合水平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大体皆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产业融合趋势向好，但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在地区分布上，却呈现较大的差距。如表 2 所列，2008–2017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除上海和江苏略有波动以外，其他省市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从年均值和排名上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间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排名前三的省市有上海、江苏和浙江，其年均值分别为 0.755、0.546 和 0.353，而排名靠后的三个省份为云南、贵州和湖南，年均值分别为 0.113、0.126 和 0.185，其中，上海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约是云南的 6.7 倍，但从各省市年均增长率来看，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增长最快

的三个省市分别为贵州、安徽和云南，年增长率分别为 19.51%、15.95%和 14.85%；增长最慢的两个省市有上海、江苏，年增长率分别为 1.50%、4.80%，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间的绝对差距是在不断缩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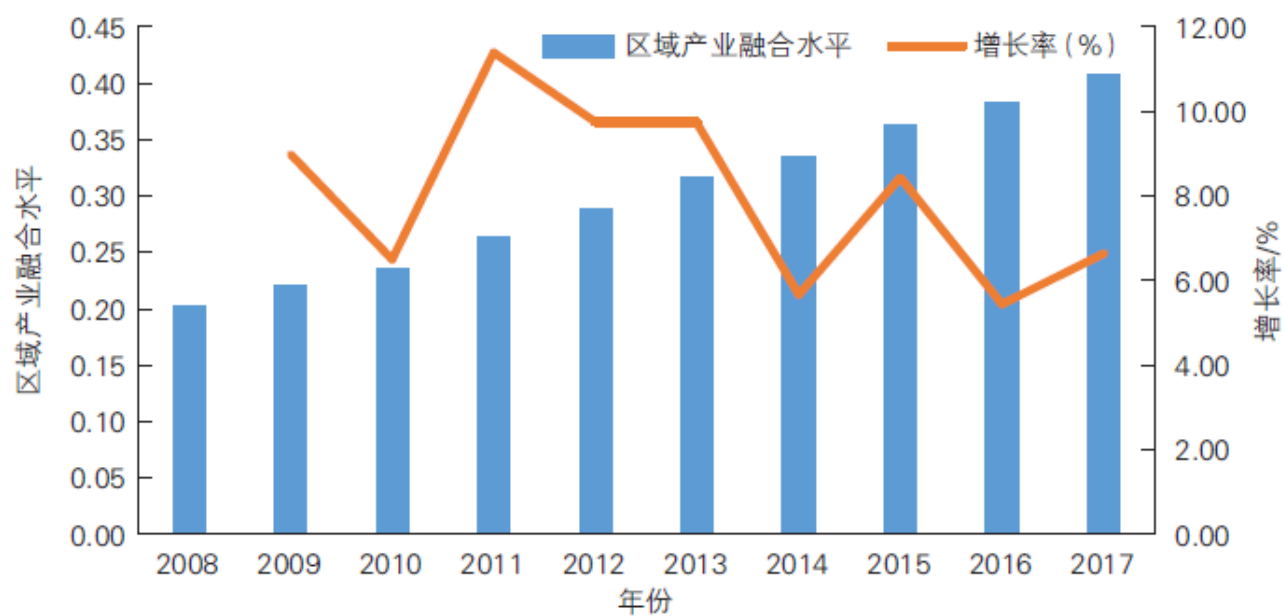


图 1 长江经济带整体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综合指数变化趋势

注：数据根据 2009-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表 2 2008-2017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融合水平综合指数及排名

地区	2008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均值	排名
上海	0.715	0.719	0.731	0.762	0.821	0.818	0.755	0.715	0.719	1
江苏	0.421	0.474	0.567	0.582	0.626	0.642	0.546	0.421	0.474	2
浙江	0.250	0.284	0.345	0.377	0.450	0.474	0.353	0.250	0.284	3
安徽	0.085	0.120	0.184	0.239	0.303	0.324	0.199	0.085	0.120	9
江西	0.105	0.146	0.175	0.214	0.265	0.291	0.193	0.105	0.146	7
湖北	0.151	0.190	0.234	0.304	0.357	0.380	0.261	0.151	0.190	5
湖南	0.096	0.127	0.171	0.215	0.254	0.284	0.185	0.096	0.127	8
重庆	0.154	0.197	0.287	0.364	0.416	0.463	0.304	0.154	0.197	4
四川	0.162	0.175	0.266	0.340	0.381	0.411	0.282	0.162	0.175	6
贵州	0.046	0.088	0.106	0.148	0.182	0.229	0.126	0.046	0.088	10
云南	0.049	0.077	0.108	0.135	0.152	0.171	0.113	0.049	0.077	11

注：数据根据 2009-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三、区域产业融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解释变量的选取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在参考学者张婷（2016）^[17]、桂黄宝（2017）^[18]文章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产业融合影响因素的代表性和可量化程度，从市场需求、科技进步、人才支持、政策支持、行业竞争等 5 个方面出发，实证研究影响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升降的主要因素。

（1）市场需求（xq）。市场需求因素对产业融合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产生的飞跃，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需求欲望不断扩张，进而刺激了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本文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市场需求。

（2）科技进步（kj）。科技的研发、创新与进步，是促进以技术融合为基础的产业渗透融合的关键。本文选取每百人专利申请受理量来衡量科技进步。

（3）人才资源（rc）。人才资源是贯穿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也是决定产业向更高更好层次发展的关键。作为经济发展、行业前进的行为主体，其区域整体人才层次的提高可以更好地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本文选取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来表征人才资源。

（4）政策支持（zc）。政府管制放松是产业发生融合最主要的外部条件，政府的政策支持则更有利于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产业融合进程。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表征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

（5）行业竞争（hj）。行业竞争的压力主要体现在行业中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大量企业涌现必然加剧企业间的兼并融合，从而促进产业融合。本文选取企业密度来衡量行业的竞争程度。

（二）模型的构建

为考察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 2008-2017 年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考虑本文面板数据特征，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ln(\text{con}_{it}) = \alpha_i + \beta_1 \ln(\text{xq}_{it}) + \beta_2 \ln(\text{kj}_{it}) + \beta_3 \ln(\text{rc}_{it}) + \beta_4 \ln(\text{zc}_{it}) + \beta_5 \ln(\text{hj}_{it}) + \mu_{it}$$

其中， $\ln(\text{con}_{it})$ 为被解释变量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对数形式， $\ln(\text{xq}_{it})$ 、 $\ln(\text{kj}_{it})$ 、 $\ln(\text{rc}_{it})$ 、 $\ln(\text{zc}_{it})$ 、 $\ln(\text{hj}_{it})$ 分别为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百人专利申请受理量、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企业密度的对数形式。 α_i 为常数项， μ_{it} 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所列，文中涉及的所有解释变量的数据皆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ncon	110	-1.41	0.66	-0.20	-3.08
Inxq	110	9.98	0.32	10.81	9.37
Inkj	110	6.87	1.19	8.87	4.40
Inrc	110	2.15	0.10	2.43	1.91
Inzc	110	1.07	0.73	2.15	-0.98
Inhj	110	10.07	1.54	13.57	7.43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次，就面板数据模型存在问题进行一一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但其随机扰动项存在明显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由于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模型单位根检验结果易出现失真现象，不具有科学参考价值，因此，这里忽略单位根检验。对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David-son-Mackinnon 检验进行判定，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均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而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一般方法——广义矩估计（GMM）的使用会减少较多的自由度，而本文的面板数据是 $n \times t = 11 \times 10$ 的短面板数据，自由度的减少会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亦不做处理。综上结果，本文宜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4 所列。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Fe	GLS
Inxq	0.480*** (0.153)	0.597*** (0.103)
Inkj	-0.075 (0.129)	0.395*** (0.087)
Inrc	0.862** (0.353)	0.340*** (0.206)
Inzc	0.072 (0.047)	0.114*** (0.027)
Inhj	0.354*** (0.055)	0.153*** (0.040)
_cons	-11.675*** (1.002)	-9.920*** (0.827)
N	110	110
R ² _w	0.9242	

注：括号外是系数，括号内是标准误差；*** $p < 0.01$ ，** $p < 0.05$ ，* $p < 0.1$ 。

（1）市场需求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在 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或减少 1%，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就相应增加或减少 0.597%。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收入不断增加，表现出来的是更为旺盛的消费欲望，人们对高质量、多功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刺激着各产业多元化发展，并在逐渐衍生融合。

(2) 科技进步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在 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可见科学创新、技术进步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间科技发展差距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整体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3) 人才资源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在 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或减少 1%,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就相应增加或减少 0.340%。人才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是产业融合的行为主体,长江经济带表现出来的人才资源对产业融合水平较强的影响,是该区域整体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体现,因此,长江经济带应继续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助力产业融合。

(4) 政策支持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在 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但其弹性系数仅为 0.114,表现出较弱的影响效果。政府管制放松是产业融合最主要的外部刺激因素,高技术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以技术渗透为基础的产业融合的支持。近年来,政府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但效果较为微弱。

(5) 行业竞争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在 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现为企业密度每增加或减少 1%,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就相应增加或减少 0.153%。一个地区企业密度越大,企业间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竞争压力就越大,从而促使各产业在互动摩擦中碰撞出融合的火花。长江流域产业遍布,大小企业更是星罗棋布,这更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孕育摇篮。

四、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在理论解析产业融合内涵的基础上,从融合动力、融合趋向、融合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以区域产业融合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产业融合水平的各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2008-2017 年间长江经济带及沿线省市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上海和江苏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虽然在个别年份上有所下降,但就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就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的综合水平来看,虽然由 2008 年 0.203 上升至 2017 年的 0.403,但其平均值仅为 0.302,距离理想值 1 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增长率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历年来的增长率波动较大,但其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8.04%左右,呈现出持续稳步上升的趋势。

(2) 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间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差距明显,大体上呈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的分布格局,其中,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年均值排名第一的上海(0.755)是排名最后的云南(0.113)的 7 倍多,但由于上游省市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下游省市,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产业融合水平地区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3) 市场需求、科技进步、人才资源、政策支持和行业竞争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市场需求、科技进步、人才资源和行业竞争的影响效果较为明显,拥有相对较高的弹性系数,说明旺盛的市场需求、与时俱进的科学技术、充足的人力资本以及强烈的行业竞争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而政策支持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提升的短板。

(二)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发挥“长江经济带”战略优势,提高区域产业融合水平。针对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的现状,我国应加快“长江经济带”战略推进步伐,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首先,政府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产学研深度结合,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合作,促进两者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其次,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应抓住市场需求,顺应民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多元化、多功能产品及服务的追求为导向,着力发展以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休闲观光农业、观光工业等新兴业态,发展以信息技术为组带的“互联网+”、大数据、VR等新兴产业,从而在提高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的同时,为长江经济带提供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长江经济带应鼓励建立特色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并相应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健全企业进出机制,给各企业提供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平台,促使各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加速企业的兼并重组融合,提高区域产业融合水平,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2) 对症下药,提升长江经济带中上游产业融合水平,缩小与下游省市的差距。一方面,政府应根据长江中上游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中上游区域的产业融合水平,对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省市来说,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够优越、经济发展相对较弱、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其产业融合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应加大对中游省市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科技、资本投入,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速其区域产业融合的进程。对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省市来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需求不足是制约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区域应着力扩大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其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发挥下游增长极作用,带动中上游区域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缩小区域差异。长江经济带下游省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等,取得了较高的产业融合水平,成为整个区域的增长极。因此应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下游省市的增长极优势,通过支配和分散效应对中上游省市的产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从而促进其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逐渐缩小区域差异。

(3)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克服制约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提升的短板效应。政府管制放松是产业发生融合最主要的外部条件,政府的政策支持则更有利于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产业融合进程。因此,为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国家应加大对该区域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长江经济带”战略步伐的同时,注重加强政策下放实施情况的监测力度,做好督导跟进工作,并根据政策实施成效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此外,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也应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方针,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并加强指导,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 [1] 胡永佳. 产业融合的思想源流:马克思与马歇尔[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8(2):70-73.
- [2] 程广斌, 杨春. 中国省域产业融合能力:理论解构、评价方法及时空分异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7):61-67.
- [3] 王巧玲. 河南省产业融合度分析[J]. 经济论坛, 2015(6):20-23.
- [4] 刘川. 产业转型中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 34(5):59-65.
- [5] 张新, 马建华, 刘培德, 等. 区域两化融合水平的评价方法及应用[J]. 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2, 47(3):71-76.
- [6] 梁君, 陈显军, 杨霞. 广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度实证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4(3):28-32.

-
- [7]严伟. 基于 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旅游产业融合度实证研究[J]. 生态经济, 2014, 30(11):97-102.
- [8]FAI F, TUNZELMANN V N. Industry-specific competencies and converging technological system.:evidence from patent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1(12):141-171.
- [9]汪芳, 潘毛毛. 产业融合、绩效提升与制造业成长——基于 1998-2011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4):530-538.
- [10]唐晓华, 姜博, 马胜利. 基于 ISCNFI 分析框架的我国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商业研究, 2015(5):1-10.
- [11]GAMBARDELLA A, TORRISI F. Does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imply convergence in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1998, 27(5):445-463.
- [12]植草益. 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2):24-27.
- [13]厉无畏, 王振. 中国产业发展前沿问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4]孙永波, 王道平. 产业融合及如何促进我国产业融合的发展[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105-110.
- [15]秦嗣毅. 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与国家竞争力[J]. 求是学刊, 2008(5):59-63.
- [16]程广斌, 龙文.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超效率 DEA—面板 Tobit 模型的实证检验[J]. 华东经济管理, 2017, 31(1):35-43.
- [17]张婷.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的实证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 2016.
- [18]桂黄宝, 刘奇祥, 郝诚文. 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影响因素[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 37(11):92-97.